

南京考古资料汇编

南京市博物馆 编

壹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考古资料汇编 / 南京市博物馆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06-1796-4

I. ①南… II. ①南… III. ①考古发现—资料—汇编
—南京市 IV. ①K87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2708号

书 名	南京考古资料汇编
编 者	南京市博物馆
责 任 编 辑	常宁文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890×1240毫米 1/16
印 张	159
字 数	3633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796-4
定 价	520.00元(全四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考古揭示的南京历史

——写在《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出版之前

华国荣

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拥有独具优势的山水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特别适合于人类的居住和繁衍。一代一代的先人们在这个区域内开垦生活,生产发展,创造了大量浓郁厚重的历史文化,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些遗产中,最为悠久和重要的是埋葬于地下和现存于地表的物质文化遗存,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历史文物。

众所周知,要全面认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其产生、发展、繁荣、衰退的演变轨迹,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记载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查找和梳理,同时,也必须对现存于地表的历史遗物进行详细的记录和考证。但是,这仅是认识、研究这个区域历史文化的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历代王朝的更替渐进,将历代先人们当时创造并留下的历史遗存都埋没于地下,这种现象,对于南京这样的叠压式城市尤其明显,所以有学者常说,南京这座城市的地下就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博物馆,一本反映南京城市史的教科书。而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地下埋藏有大量的古墓葬和古遗址,这其中更是包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因此,要全面揭示、阐释、复原南京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面貌以及它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态,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日趋显现,且愈发重要。对这些地下的古代物质遗存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完备准确的记录、客观公正的解读、切实有效的展示保护、传承和利用构成了考古工作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这也是南京考古工作的职责所在。

南京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历史悠久,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到今天,从未中断,已成为研究南京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1915年6月成立于南京明故宫遗址内午门旁边原明代方孝孺祠旧址的国立南京古物保存所,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专业考古机构,内设古物、图书、总务、民族资料搜集处等四个部门,在当时就开始从事南京六朝古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同时,也对明孝陵等一些重要的地面遗存进行过考古调查。特别是1929年,对明故宫外五龙桥一带发现的明代建筑构件和遗物进行过清理和研究,当时的所长卫聚贤先生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其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小史》一书中专门对此作了专节的介绍,这恐怕也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了。在此以后的几十年时间中,特别是解放以来,从中央、省、市各级都成立了

相应的专业考古队伍,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得以逐渐展开并日益壮大。

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时间跨度漫长,从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发现,到民国时期地下遗骸的出土,上下几十万年的历史跨越,这在全国其它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中是不多见的,这也正说明了南京地区地下历史资源的丰富和考古工作的成就。长期以来,由于方方面面条件的限制和工作侧重点的不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考古发掘工作绝大多数都是抢救性的工作,有计划、有目的的主动考古工作极少,这也大大的限制了我们对南京全部区域内地下古遗存的全方位的认识,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也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总体来说,史前阶段的资料相对较少,六朝、明代古墓葬的资料最为丰富,汉代和宋代的发掘资料也相对较多。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已经做了考古工作的遗存,如大量汉代墓葬、明故宫遗址、六朝建康城遗址等的资料仍在整理之中,未能及时发表,一些重要的家族墓地的资料,也只见零星的发表,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考古报告。为了便于总体了解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现按考古界通行的时代序列,对每个历史时期主要的考古发掘成果作概要性的归纳和分析(主要限于已经正式发表的考古资料),以供方家指正。

(一) 旧石器时期

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在1993年南京汤山直立人化石地点发现以前,对南京地区旧石器的了解就仅局限于一些动物化石的发现和溧水神仙洞化石地点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博物院于1977年、1978年进行了二次考古发掘的溧水神仙洞化石地点中,出土遗物除了棕熊、豪猪、中国鬣狗等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一块成年女性的右颞骨化石和一块陶片,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由于这一地点的时代在整个旧石器阶段中属于较晚的一段,距今一万年左右,当时的发掘未能受到很好的重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点的发现,给我们认识旧石器晚期动物化石的特点和人类早期使用陶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90年,汤山葫芦洞古人类化石地点的发现,特别是1993年二具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出土,迎来了中国旧石器时期考古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也将南京地区最早出现人类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约35万年(另一说约55万年)。经考古发掘后确认的4目、11科、13属、15种古脊椎动物化石中,绝大部分和北京周口店的动物群种属相似。二具古人类头骨化石,石化程序较高,特别是一号头骨,形态基本完整。二具头骨分别代表了二个成年的男女个体,经研究,该二具头骨代表的人类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直立人”阶段,学术界称之为“南京直立人”简称“南京人”,又俗称“南京猿人”。

南京人化石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对世界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也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地球上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一直是各国科学家孜孜不倦为此努力的方向,人类起源于何处?是如何进化的?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展繁衍的?特别是现代人的起源等问题,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然在探索的课题。有一点公认的是: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发现古人类化石(主要是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最多的国家,如著名的北京猿人、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四川巫山

人、湖北郧县人、安徽和县人等,因此,中国大陆也成为世界研究直立人阶段人类体质特征、起源、发展等问题的中心地所在。南京人的发现,为这一研究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我国直立人阶段化石地点的分布增加了新的区域,这是目前为止长江流域发现人类化石地点最东的一个。和北京猿人动物群相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存在,对研究古代地理环境、动物迁徙、气候变迁等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又进行了一些工作,主要发掘了汤山的驼子洞早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同时也对南京江北、江南和一些旧石器地点进行了考古调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南京地区旧石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客观地说,南京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一处完整的旧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虽然在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些旧石器等方面有一些发现,但对于整个区域内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还不甚清晰,把它放在长江下游区域内来考虑,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可以说,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任重而道远。

(二) 新石器时期

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开始得比较早,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这也是南京主城区内惟一一处发现和经过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54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收获中以第四层发现的271座古墓葬为代表,层层迭压,分布密集的古墓葬群的发掘,在本地区同类遗址中是较为少见的,出土的红、白、黑三色的彩陶,以鼎、豆、罐、碗、盆、壶等器物为代表的器物群,以数量较多的各类石器、玉器等为代表的遗存,展现了这一时期本地区特有的古文化面貌。

1997年发掘的高淳薛城遗址,虽然发掘面积仅为100平方米,但收获重大,意义非凡。上层密集的墓葬群代表的遗存和北阴阳营的文化面貌相当,下层丰富的建筑基址所代表的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面貌相似,这也是目前南京地区发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1982年发掘的浦口营盘山遗址,1988年发掘的六合羊角山遗址,其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和上海地区的崧泽文化更为相似,特别是营盘山遗址,为一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墓地,共发掘31座,墓葬密集分布于营盘山北坡,排列有序。时代特点比较单纯,以鼎、罐、壶、豆、盆、杯等器物群以及以穿孔石斧、石锛、石凿为代表的石器和丰富的以玉璜、镯、环、玉动物模型、玉料等代表的玉器遗存,既显示了浓郁的崧泽文化因素,又体现出了这一地区特点鲜明的玉文化特色。

1989年发掘的高淳朝墩头遗址和1979年发掘的江宁陶吴胥庙遗址,以下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除了有崧泽文化因素外,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良渚文化因素,特别是胥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冠饰(梳背),极具良渚文化的色彩。

除上述较为重要的遗址外,南京地区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还有太岗寺遗址、锁金村遗址、安怀村遗址等等。需要另外说明的是:经过发掘的江宁点将台遗址和江浦牛头岗遗址,这二处遗址的主要文

化内涵为商周时期堆积,但是其下部堆积所反映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时期的文化因素,体现了较强的北方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

综观南京地区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结合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成果,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在江北的浦口、六合二区以及江南的高淳县等地,但是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地点却很少,而且一些发掘材料未能及时的公开发表,这也使得我们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还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研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从已发表的资料和初步的研究来看,本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南京这一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文化中既有北方文化的因素,又有南方长江下游文化的特征。以薛城遗址上层堆积和北阴阳营遗址第四层堆积为代表的是属于本地区特色的文化面貌;在薛城遗址下层、营盘山遗址、朝墩头遗址、胥庙遗址中都体现出了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情况也充分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南京地区就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流、渗透、融合的交汇地区。要全面准确的理清南京地区、甚至更大一个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 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21年)

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遗存数量丰富,但经过发掘的地点不多。其遗存特色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古遗址、土墩墓、贵族墓地。

古遗址一类,其外貌通常都表现为高出地面几米不等的“台形”遗址,遗址的主要堆积都为商周时期,但其底部一般都仍有新石器时期的堆积,如上述提到的牛头岗遗址、北阴阳营遗址、朝墩头遗址、胥庙遗址、点将台遗址等等。包括学术界颇具影响的“湖熟文化”遗址,其底部都有新石器时代的堆积,2010年对江宁老鼠墩遗址的局部发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南京地区经过考古发掘的这一时期的遗址主要有江浦曹王滕子遗址、江浦蒋城子遗址、江宁点将台遗址和江浦牛头岗遗址。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点将台遗址和牛头岗遗址。点将台遗址为一处位于江宁汤山桦墅村的山间盆地中的“台形”遗址,高出地表4米,面积3000平方米。1973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130平方米,该遗址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其堆积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特殊,上、中、下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均具很强的时代特征。分别代表了夏、商(湖熟文化)、西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下层堆积中反映出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山东岳石文化的因素,和牛头岗遗址下部堆积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很为相似,代表了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本地文化和北方地区的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文化面貌。

还要一提的是: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有一类是被命名为“湖熟文化”的“台形”遗址。这群以江宁湖熟镇秦淮河两岸密集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遗址而命名的古文化遗存,在宁镇地区分布的数量较多,著名的有梁台、老鼠墩、小宝塔山、城岗头等地点。以发掘的老鼠墩为例,遗址中以红陶为主;鬲、甗、盆、鼎、罐为主要的器物组合;以长条形石铤、半月形石刀为主的生产工具,这些特征代表了宁镇

地区的主要文化面貌,其时代和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相当。

古墓葬一类,即宁镇地区特有的商周时期土墩墓,数量极为丰富,主要分布在南京和镇江及皖南的部分地区。经过发掘较为重要的有溧水柘塘、乌山土墩墓,高淳顾陇、永宁土墩墓,江宁陶吴土墩墓,溧水凤凰井土墩墓等,这种外表地貌形似“馒头状”的古代文化遗存,实际上是这一区域独具特点的商周时期古墓葬,考古界称之为土墩墓,这些土墩的外观大小不一,加之后期的自然或人为侵损,其直径和高度都有所不同,如2007年发掘的江宁陶吴竹连山一号土墩墓,其底径东西长48米,南北长达62米,高为9.1米,是近年来已发掘的土墩墓中体量较为庞大的一处。

土墩墓内一般有一座或多座古墓葬,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连续的、细致的发掘,对这一特殊形制的古墓葬的形成过程、建筑方式、时代特征等都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一般而言,土墩墓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从随葬的器物来看,多为陶鼎、硬陶罐、钵、瓮、碗等,大多饰有繁琐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几何纹图案。墓葬中还往往同存有数量较多的原始瓷器,据其时代不同,有豆、盅、钵、碗等,这些随葬品代表了这个地区商周时期的器物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以来在土墩墓的发掘中,对其营造方法和墓葬结构的研究愈来愈得到发掘者的重视,如土墩从下至上的形成过程、一个墩内拥有一座或几座墓葬、不同墓葬的埋葬方式、与其同存的无序分布的器物坑、多种形制的房屋及建筑遗存、零星分布的单个器物及碎片等等问题中,仍有一些还不很清晰的地方。同时,由于土墩墓跨越的时间较长,从西周至东周,各个不同阶段的埋藏方式的器物特点等仍有多样的差异,仍需在每一次的考古发掘中进行不断的甄别和研究。

贵族墓地一类,在南京发现的不多,最为重要的当数六合程桥发现的3座东周墓。分别于1964年、1972年、1988年由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进行抢救性发掘。3墓应都为竖穴土坑墓,其时代均为春秋晚期。墓葬发现时遭破坏,特别是3号墓葬,其墓葬结构已不甚清楚。但3墓中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成组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瑚、盘、匜、甗等青铜容器,编钟、缶等乐器,剑、戈、戟、矛等兵器,还有小件的车马器等。特别重要的是在编钟、盘、匜、瑚等一些器物上都发现了铭文,据发掘者初步研究,此类器的主人是“坪之子”,该墓地应为吴国时期的一处贵族墓地;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的铜匜应为“罗兒”铜匜,还发现有“曾子義行”铜瑚,有学者认为,此件“曾氏”铜器应和楚国的曾氏器有关。

程桥东周墓地的发现,是南京至今为止惟一一处经考古发掘的商周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地,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吴国、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3座墓葬的发掘相隔时间较长,又都属于抢救性发掘,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因此,对这一地点的全面考古工作是我们以后的工作中不能忽视的。

南京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存,除了上述的古遗址和墓葬以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有南京浦口长山子发现的青铜器等,数量也较为丰富,这些器物的形态特征和程桥东周墓地以及一些土墩墓中出土的器物有很多的相似性,代表了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是研究宁镇地区吴、越、楚青铜文明的重要资料。

(四) 秦汉时期(秦: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反映在地下遗物的面貌上,特别是出土随葬品的特征上,在全国有较强的一致性,南京也不例外。南京地区这一时期已发掘的古遗存都为汉代时期,未发现秦代遗存。从类型上看,大多为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仅有六合李岗楠木塘西汉建筑遗迹一处。从区域分布看,已发现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六合、栖霞、江宁湖熟、高淳、溧水一些地区。从墓葬形制来看,西汉时期普遍流行竖穴土坑墓,东汉时期则流行砖室墓。主要有以下一些地点:

一是湖熟地区的汉墓,数量众多,上个世纪90年代,南京市博物馆集中发掘过一批汉代墓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朱氏家族墓地,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漆木器和木牍,具有明确的纪年,其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特别是其中的一座墓形制独特,为砖、木混合的构造,从墓葬形制中也反映出了从西汉至东汉这一过渡阶段的显著特征。二是南京城北栖霞区一带发现的汉墓,其墓葬规模虽不大,但发现的一些石室墓颇具特点。三是高淳、溧水一带的汉墓,从已发现的情况看,这一区域的多为东汉砖室墓,其中以固城一带东汉画像砖室墓最具特色。四是六合境内的汉墓也发现较多,主要集中在横梁一带。经初步分析,南京地区的汉墓时代跨度较长,从西汉至东汉都有存在。分析以上已发现的汉代墓葬不难发现,这些墓葬的分布区域都和当时的郡治所在地有紧密的关系,湖熟郡所在范围不但有大量的平民墓存在,更有一些高等级的诸侯墓葬的存在,在1994年的考古发掘中,经过调查已发现了一些端倪;栖霞有汉代江乘县的存在;高淳更是著名的固城范围所在地;六合汉墓也所处在棠邑故城范围一带。其中六合灵岩乡李岗汉代铸钱作坊遗址的发现及干栏式结构房屋建筑的发掘,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了重要的线索。因此,在了解整个汉代古墓葬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对当时古城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工作任务艰巨,科学的、有规划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还等待着我们。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我国历史处于大分裂及南北对峙的局面,战火动荡,朝代更替频繁。地处长江南岸之南京,自公元229年孙吴迁都至南京,至公元589年陈朝灭亡,共有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6个王朝定都南京,史称“六朝古都”,南京因而第一次成为国都,前后延续360年。正是这个原因,南京发掘的这一时期古墓葬,在其发掘报告中都称之为“六朝墓葬”。这个时期发掘的古遗存,主要为古墓葬和古城址遗迹等,其中古墓葬数量为全国之最。

六朝墓葬,一般都为砖室墓。由于早期发掘的都是相对容易识别的砖室结构的墓葬,土坑墓往

往容易忽略。其实在以后的发掘中,仍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土坑墓的存在。从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来分析,砖室墓和土坑墓之间是有一定的等级差别的。从东汉开始,古人在死后逐步用砖来砌作墓室,到六朝时期已是非常流行了,特别是从六朝开始,除了在墓中用砖外,在城市建设中也开始用砖,特别是在城中道路、水井、城墙外侧、房屋建筑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六朝砖发现,这种城市开始用砖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建设中是比较领先的,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先河。从1998年起,南京市文物部门开始对六朝最早的城市——石头城进行调查和发掘时,就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六朝砖,这些主要用于城墙外侧进行包砌的城砖显得宽厚、敦实,有些还带有纪年,这些发现让我们领略了距今1800年前城市建设用砖的实况。

而在墓葬中用砖就更为频繁,从东吴开始至南朝陈代结束,墓葬用砖的过程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主要在用砖的长宽大小、厚薄差异、表面装饰纹样的区别等方面都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另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墓葬位置上也表现出了颜色和形状上的一些区别,因而出现了方形、长方形、刀形、楔形等不同形状的墓砖。从总体看,早期砖块相对尺寸扁小、制作粗糙、颜色多样,装饰多用几何形纹及放射状钱纹等;晚期砖则尺寸稍大、制作精细,装饰多用植物花纹及人物、动物等。

六朝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品等在不同的时代,早晚差异较大,其平面结构早期多流行前后双室附前后甬道的穹窿顶墓和四面坡顶墓,也少见有单室长方形叠涩顶墓,自东晋至南朝时期多流行单室凸字形券顶墓,墓壁以“三顺一丁”的形式砌建,墓底部铺“人”字状地砖,有砖砌“棺床”和“祭台”,前室设置排水口、沟,左、右、后三壁都设有“壁龛”,有些墓室四角部都有“灯台”设置,墓道内一般均有砖砌排水沟。除此之外,墓葬形制的差别在于不同时期墓葬等级的不同,在规模大小、平面结构、封门、棺床、祭台、用砖装饰等设置方面有较大的差别。

六朝墓中的随葬品,也是随着六朝一代从早期到晚期有较大的变化。器物组合中的主要器类如罐、壶、碗、钵、灯等前后呈现了一个有变化规律的过程,一些特殊器类显示了特定的阶段性和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

孙吴时期(222年至280年)的墓葬:南京发现、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墓葬较多,特别是一些孙吴纪年墓的发现,给这一时期的墓葬树立了确实的标尺,发现的纪年有“赤乌”、“五凤”、“建衡”、“永安”、“天册”、“凤凰”、“天玺”等,这些纪年文字多见于墓砖上的模印文字和砖刻地券,墓葬多为前后双室穹窿顶,随葬品以陶器、瓷器、铜器等为主,其中以家畜、圈、仓、井、厕等为组合的“仓储明器”最具时代特征。这些已发掘的墓葬中除江宁及北郊郭家山等一批纪年墓外,更为重要的有:雨花区长岗村五号墓,出土了著名的釉下彩青瓷盘口壶和一批六朝早期的青铜器;江宁上坊东吴大墓,为这一时期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墓葬,应为东吴孙氏宗室之墓,墓中出土的大量青瓷器应为这一时期青瓷的代表之作,特别是一批青瓷乐俑的发现,填补了空白;南京大光路薛秋墓的发现,是继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后为数不多的有明确墓主人的墓葬。

孙吴时期的古遗址发现的不多,最为重要的就是石头城的考古调查和试掘,目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西晋时期(265年至317年)的墓葬:这一朝代首都都不在南京,但作为一个短暂统一的王朝,南京

地区的西晋墓数量众多,考古发掘者将此阶段的墓葬划出,最大的原因是发现了一批有明确纪年的西晋时期墓葬,目前已发现的西晋纪年有“太康”、“永宁”、“元康”、“永兴”、“永嘉”等,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孙吴时期有较大的相似性,随葬品中以青瓷器为主,以吴末晋初这一阶段出现的青瓷、陶质堆塑罐最具时代性和代表性,此类器物造型繁缛,形式多样,仅在东吴至晋初这一时期出现。墓葬中较为重要的有板桥石闸湖“永宁二年”墓等。

东晋时期(317年至420年)的墓葬:西晋司马氏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南京又重为首都,史称建康。这个时期是六朝发展的繁荣期,经历了六朝中最长的103年的光阴,古墓葬数量最多且最具特色,大量纪年墓的发现,特别是一大批世家大族墓地的发掘和一些帝陵性质的墓葬的出现,大大加重了东晋墓葬的厚重性和特色性,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迄今为止,发现的东晋纪年有“大兴”、“泰宁”、“咸和”、“咸宁”、“咸康”、“永和”、“泰和”、“泰元”、“升平”、“咸安”、“宁康”、“义熙”等年号,这些纪年墓多出于东晋世家大族墓地之中。到目前为止,南京地区经考古发掘和确认的世家大族墓地有:北郊象山王氏,老虎山颜氏,郭家山温氏、王氏;东北郊吕家山李氏,仙鹤观高氏;南郊戚家山,司家山谢氏等。除此之外,未经发掘但有重要线索的世家大族墓地还有江宁祈泽寺附近的荀氏家族,中山门外苜蓿园一带的桓氏家族等。除此之外,东晋帝陵的考古工作也有重要的发现,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富贵山发现的晋恭帝玄宫石碣及一些大型的墓葬或墓葬群,证明了文献记载的东晋“东陵”在富贵山、覆舟山一带存在的事实。南京大学北园墓、北固山大墓的发掘,发掘者推测也为部分帝陵,同样也基本证明了文献中的东晋“西陵”在北极阁、鼓楼一带的可能性。幕府山一带大墓的发掘,也给寻找东晋一些王侯墓、皇后墓、帝陵等高等级墓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现实的问题是:东晋时期帝陵及世家大族墓地的考古工作,是有很多遗憾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加上当时考古工作的局限性,这些墓地今已大多不存,原来的帝陵范围、分布格局也已无法弄清,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的现实。世家大族墓地也大多不存,当前自然地形、地貌还大致存在的北郊象山、老虎山、幕府山一线也许将成为了解东晋大族墓地的希望所在。

东晋墓中的随葬品,主要器物组合中的主要器类继续存在,器型普遍浑圆敦实,端庄大方。一个显著特点是:墓葬中常常有同类器物大量存在的情况出现,如富贵山东晋墓地、铁心桥东晋墓集中出土的盘口壶,郭家山东晋墓地集中出土的四系罐等等。同时,这一时期又新增多类不同质地的器类,最主要的变化是墓志类葬品的出现和金、银、玉器及一些特殊类葬品的较多出现。东晋墓志,多为砖质,少数石质,砖面阴刻字数不多,是世家大族墓主身份的象征。墓志等其它新器类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东晋历史文化研究的内涵。王兴之墓志出土引发的《兰亭序》书法真伪的大讨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吕家山高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特别是成组的玉佩等礼器组合填补了六朝时期玉葬品组合的空白。

南朝时期(420年至589年)的墓葬:169年的王朝历史,分为宋(420年至479年)、齐(479年至502年)、梁(502年至557年)、陈(557年至589年)4个朝代。这一时期的墓葬数量众多,墓葬形制的多样性增加,在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中,墓室内外出现砖柱设置,墓壁出现弧形,壁上装饰花纹及画像的情况多见,出现“火焰形”壁龛,石门、石棺床、石质器物及墓志都有出现。南朝早期(即刘宋时期),墓葬形制及出土随葬品和东晋晚期体现出了较强的连续性,一些墓葬单凭形制和葬品较难区分是东

晋晚期或是南朝早期。这阶段重要的墓葬有“元徽二年”的明昙禧墓、隐龙山南朝墓等。萧齐、萧梁二代,以发掘的几座萧梁时期的王侯墓最为重要,其中有桂阳简王肖融夫妇墓(天监元年,502年;天监十三年,514年),梁“普通二年”墓,桂阳王萧象墓以及南平王萧伟墓阙的发掘。陈代墓葬中主要有太建八年的西善桥黄法氾墓。除此有明确纪年的墓以外,这一阶段还发掘了一批重要的贵族墓葬,尤其是在西善桥发掘的有“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被发掘者推测为帝王一级的墓葬。

必须要重点阐明的是:这一时期和此之前的六朝其它时期不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目前南京还保存有一批南朝帝王陵墓前的石刻,这些散落分布于京畿周边的神道石刻,是我们了解南朝帝王陵及宗室王侯墓葬分布及布局的重要实物证据。因此,围绕这些地表现存石刻而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才是南朝古墓葬发掘的重点所在。据文献记载,南朝一代,至少有百余座帝陵、宗室、王侯墓葬的存在,由于朝代更迭频繁,战火动荡以及人为、自然的损伤等历史的原因,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墓葬已无处查寻,现存石刻的存在为我们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最理想的线索。南朝石刻现存34处,其中南京范围22处,丹阳、句容12处。南京的石刻主要分布在栖霞、江宁二区,就目前而言,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梁安成康王萧秀墓、1979年发掘的梁南平郡王萧伟墓、1980年发掘的梁桂阳简王萧融墓、1997年发掘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四处,是经过考古发掘后可以确定或基本确定的墓葬。而萧憺墓和萧景墓、萧暕墓、萧正立墓等是经过神道碑和望柱额的文字记载而认定的。而其它石刻所代表的帝陵或王陵都没有经过考古发掘或者准确的文字考证,更不用说还有部分至今失考的石刻遗存。

从考古工作的角度而言,对这些石刻的全面认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准确弄清该石刻所代表的墓葬的位置、结构、平面布局以及墓主人、时代等重要元素。一千多年的风雨激荡,特别原始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的变迁,使得一些墓葬仅见石刻,不见墓室,更谈不上整个墓地的总体情况。因此,对现存石刻周边的区域进行全面科学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同样,对现存南朝石刻的规划和保护也需要考古工作者付出相应的努力。就目前来说,位于栖霞狮子冲的一组石刻,其周边地形地貌尚存,应是我们了解南朝帝王陵全面情况的希望所在。

除此,还有一个墓区的问题,现存石刻虽然分布较散,但它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按照中国古代墓葬埋葬制度,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同的朝代、帝王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区。一座陵、王墓有自己的墓园,多座陵、王墓就有它自己的墓区,一个朝代,它可以有一个墓区,也可以有多个墓区。在这些陵、王墓周边还会有一些陪葬的贵族墓葬存在,这是一种基本的规律。将这些已知的墓葬摆在一个大范围内,根据墓葬地点、等级、分布特点等情况进行综合的平面分析,辅之于历史影像和原始地形地貌图,是可以逐步解决陵、王墓区这一问题的,这也是考古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历史责任。现有六朝石刻的分布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位于丹阳一带应是萧齐时期的一个墓区;位于南京栖霞甘家巷一带应是萧梁时期的一个墓区,其余石刻存在的地区的情况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补充和考证。

总之,南京地区发现的六朝墓葬,无论从数量、墓葬种类、出土文物的丰富及精美程度,在全国的六朝墓葬的发掘中是最具特色的。因此,几十年以来,六朝墓葬的发掘,历来是南京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点所在。

六朝时期的地下遗存,除了上述数量最多的古墓葬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其中主要的有六朝古城的遗迹和石窟遗存等。从石头城至白下垒,从建邺城到建康城,六朝时期城市的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古城址遗存的发掘起始于21世纪初期,这过程中除了发现一些零星瓦当、石塔构件、“明堂”砖、寺庙泥塑造像、钱范等遗物外,最重要的当数建康城址遗迹的发掘。南京市文物部门在近十余年的时间内,利用南京旧城改造的机会,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采取了以课题为引领,见缝插针的方式展开了长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勘探、发掘地点二十余处,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资料,为探索建康城遗址的面貌获得了重要的线索,目前资料整理正在进行之中;石窟寺遗存,就是位于栖霞千佛岩的南朝造像遗存,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目前资料已整理完毕,考古报告即将出版;南京钟山坛类建筑遗存的考古发掘,是迄今为止对六朝建筑遗存的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初步弄清了六朝时期作为国家坛类礼制建筑的基本特征。

六朝建筑遗存的发掘,相比于古墓葬的发掘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此类遗存都埋藏于现代主城区的范围内,考古发掘机会不多,一些遗迹现象较为零散,很难进行全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随着以后现代化的旧城改造建设逐步减少,这一工作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因此,把握住现在不多的时间多进行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是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一项艰巨和重要的任务。

(六) 隋唐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唐、南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代几个时期,在南京地区发掘的主要为南唐和宋代时期的古墓葬。

唐、五代(唐:618年至907年;五代:907年至960年)的古墓葬主要有“贞元”、“大中”、“同光”、“保大”等年号的古墓葬。这其中以南唐陵园的考古发掘最为重要,建国初期发掘的“南唐二陵”,是南京目前惟一发掘的帝陵,墓内大量珍贵的文物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之物。2010年,南京的文物部门对南唐二陵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陵园的四至陵墙和相关的陵门遗迹,同时又在二陵的西北面又发现了一座南唐时期的墓葬,其墓主人被推测为南唐宗室成员。这次考古工作,是“南唐二陵”发掘60年后又一次重要的工作,不仅明确了陵园的范围,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园内遗存的内涵。1999年发掘的杨吴宣懿皇后墓中出土的刻画天文星象内容的墓志盖,顶部平面由外及内刻有“四神”、“二十八宿”、“十二生肖”、“八卦”等图案,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古遗址主要有九华山古铜矿开采点、南唐宫护城河遗址以及被疑为南唐“伏龟楼”建筑基址等等。

两宋时期(北宋:960年至1127年;南宋:1127年至1279年)的遗存,多为墓葬,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景德”、“天圣”、“景祐”、“治平”、“元丰”、“熙宁”、“乾道”、“庆元”、“咸淳”等时期的墓葬,这其中重要的墓葬有: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江宁牧龙镇秦桧家族墓,下关幕府山宋墓,江浦星甸宋墓,江宁南宋周国太夫人墓等,这些墓葬当数秦桧家族墓的发现、发掘最为重要。这些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精致的金、银、铁器和瓷器,如吉州窑卷草纹瓶、定窑印花碗、银盘、青白瓷注子、定窑冰裂纹瓷

盘、瓷枕等等。还有一些墓葬中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木尺等也颇为珍贵。另外,近年在将军山发掘的王安石家族墓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这时期遗址发掘的主要有江宁方山定林寺、长干寺塔基,江浦顶山定山寺等,其中大量的考古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元代(1271年至1368年)时期的遗存发现不多,重要的有溧水永阳镇的元代窖藏和容国公容国夫人墓等。

(七) 明朝时期(1368年至1644年)

南京是明朝的开国首都,1368年至1421年为明早期的都城,1421年至1644年仍作为明代的“留都”二百余年,因此,在南京周边发现的明代墓葬数量众多,且等级较高,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主要为当时的建朝功臣及其家族之墓,这些功臣大都被封王、公、侯和赏爵,除此之外,同时还有大量的贵族及宗室墓葬。明代墓葬,因大部分墓中都出土有墓志,因此发掘的墓葬中,不仅出土有大量精美的器物,更是发掘出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为研究明代历史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史料。在众多的墓葬中经过考古发掘重要的主要有:朱元璋明孝陵和太子明东陵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紫金山西、北周边作为明孝陵陪葬墓的板仓一带中山王徐达家族墓(经过发掘的主要有徐钦墓、徐侑墓、徐膺绪墓等);岐阳王李文忠家族墓;江国公吴良墓,吴忠墓;海国公吴祯墓;皖国公仇成墓等。其它经过发掘的还有:江宁将军山黔宁王沐英家族墓,中华门外戚家山虢国公俞通海夫人于氏墓、南安侯俞通源墓,安怀村蕲国公康茂才墓;中央门外汪兴祖墓;中华门外邓府山西宁侯宋晟家族墓及其子宋琥和安成公主墓(江宁区东善桥)、宋瑛和咸宁公主墓(溧水县乌山乡团山);薛显墓,驸马赵辉、宝庆公主墓,福清公主墓等等。除上述主要的一些墓葬外,还有大量的贵族宗室墓葬,如张云墓、蔡国公夫人武氏墓、长兴侯夫人陈氏墓、郢国夫人樊氏墓、穀城郡主墓、孝宗皇后家族墓、华伟夫妇墓等等。有些墓葬未经过考古发掘,但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和墓前神道石刻,如徐达墓、常遇春墓、李文忠墓、李杰墓、邓愈墓、顾兴祖墓、王以旗墓、庄昶墓等等

综观明代墓葬的发掘,为我们了解明代王公贵族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惟一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考古发掘的局限性,发掘时主要注意到的是墓葬的本体,而对于墓葬周边的环境缺乏更多的工作,特别是对墓葬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总体布局,平面结构等问题认识不够,以至于一些重要的功臣墓葬只见基本体而不见墓园整体的情况较为常见。这其中以徐达家族墓、李文忠家族墓、沐英家族墓最为典型,这导致了近几十年来在板仓、蒋王庙一带发现的一些贵族墓,由于没有明确墓志的出土,常常产生混淆的现象。将军山沐英家族墓地,是所有明代功臣家族墓葬中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保存相对最好的墓园,由于特殊的地貌特征,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加上考古发掘工作的不连续性,至今对于墓园的总体情况虽然有个大概的了解,但还没有全部弄清,虽然经过2004年以来重新开展的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大的墓园格局基本弄清,一些墓主身份得以重新认定,但是墓园范围、

园内布局结构、诸墓之间的享殿、神道、石刻等诸多问题也将成为不解之谜,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在数量丰富的明代墓葬中,有一类墓葬不能不提,那就是宦官墓葬的发掘。作为明代一个特殊的阶层,宦官享有着种种特权和地位,因此,宦官墓葬的发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南京地区经过考古发掘的宦官墓主要有吴经墓、洪保墓、怀忠墓、杨庆墓以及“正统”、“天顺”、“成化”、“正德”等年间的宦官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墓志,为解决明代一些历史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吴经墓出土的紫砂壶、仪仗俑阵等,极为珍贵;洪保墓志中提及的“五千料船”,为研究郑和下西洋船只建制和规模等问题提供了最真实的史料。

南京明代其它地下遗存的考古发掘也较为丰富,这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明代城市遗址开展的一些工作,从明代外廓城、都城、皇城、宫城多个不同的层面,近十年来考古工作有了不小的收获,取得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大量精美的文物,这其中包括有通济门的历次发掘、明故宫遗址中一些重要构件的发现、明代下水道的发现、明代宝船厂船用构件的发现等等。但由于明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受基建和地面建筑的影响,发掘的面积较小,很难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对城市的地下遗存进行全面的揭露,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对局部的地点进行串联和诠释,对一些重要的节点进行保护和展示。目前,这些考古发掘的资料正在系统的综合整理之中。

除此之外,明代宝船厂遗址和报恩寺遗址的局部发掘,是明代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经过发掘最为重要的内容。目前,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材料也在整理之中。

明代地下遗存中出土的随葬品,数量种类繁多,其精致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具代表的金、银、玉器、宝石器以及各类瓷器都代表了明代高超的工艺和先进的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种质地的带板的发现,这是研究明代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如汪兴祖墓出土的金镶玉腰带、板仓明墓龙纹金腰带、蛮狮纹琥珀腰带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物;以沐英、徐达家族墓出土的金、银、玉质的饰品,富贵堂皇,极具观赏性;以青花、龙泉、白瓷等代表的大量瓷器,是明代青瓷高超手工技艺的最好见证;如沐英墓出土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天堡桥明墓出土的“内府”白瓷梅瓶、宋琥墓出土的釉里红“岁寒三友”梅瓶、明代太庙古井及张云墓、尹西村明墓中出土的龙泉瓷器等都是明代瓷器中的精粹之作。一些保存完好的纺织品的出土,是研究明代服饰工艺的翔实资料。

在大量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除了出土有墓志以及随葬品丰富、价值较高的墓葬已正式发表之外,仍有一批经过发掘而没有发表的墓葬,特别是数量较多的明代土坑墓的资料仍未见之于报刊。而在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大量石质墓志的发现,弥足珍贵。这些墓志,往往由于墓主人身份较低,出土的陪葬品较少而被发掘者忽视,而事实上对这些墓志的释读和考证,可以大大丰富完善了明代史料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八) 清代至民国时期(1644年至1949年)

这一阶段的地下遗存的发现、发掘工作,在较早的时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已不属于地下考古发

掘工作的范畴,以往的考古工作对该时段的遗存基本上不做科学的发掘,近几年来,随着考古工作内涵的延伸,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遗址、遗物,也纳入了考古发掘和考证的范围。本考古资料汇编中也收集了相当一些篇幅的这一阶段的资料,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一些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和考证,以清代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碑刻、壁画、构件等发现较多,绝大多数现存于地表而得以看到。这其中以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地”的考古发掘最具影响,在1998年、1999年及2006年,南京市文物考古部门在江东门工地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现了二处计二百多具遗骸,从考古发掘的角度证明了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犯下“南京大屠杀”这一滔天罪行的历史事实。目前,这些遗骸已原地、原貌地得到了保护和展示,已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最主要的展示点之一,这也是考古工作服务于历史、服务于社会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建国以来,南京地区的考古成果丰富,虽然仍有大量的资料未能及时发表,但从已发表的资料中大致能反映出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特点和成就。对这些考古资料作全面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并不是上述短文能得以解决的。希望本考古资料汇编的出版,能有助于考古同行、各界学者对南京考古工作的了解,推动南京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2013年5月

目 录

考古揭示的南京历史——写在《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出版之前	001
-----------------------------------	-----

(一)

1. 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	001
2. 南京市文物古迹普查情况综述	029
3. 六合县发现一千万年以前的动物化石	034
4. 南京汤山葫芦洞直立人化石地点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035
5. 溧水神仙洞发现一万年前陶片	041
6. 江苏溧水神仙洞第二次发掘	045
7. 江苏南部旧石器调查报告	047
8. 江苏江浦旧石器地点调查	056
9. 江浦县“湖熟文化”遗址的调查——兼谈吴国早期疆域的北界问题	061
10. 江苏高淳县蓆薛城遗址的植物蛋白石分析	064
11. 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071
12. 江苏江宁县两处古文化遗址	096
13. 江苏仪六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调查	097
14. 记湖熟镇发现史前遗址	102
15. 南京北郊发现石器 etc 等遗物	106
16. 南京城内阴阳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情况	107
17. 南京锁金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08
18. 南京中央门外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11
19. 簪庙遗址内涵的初步分析	112
20. 江苏江宁元山镇遗址的试掘与调查	116
21. 南京安怀村古遗址发掘简报	117
22. 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	125